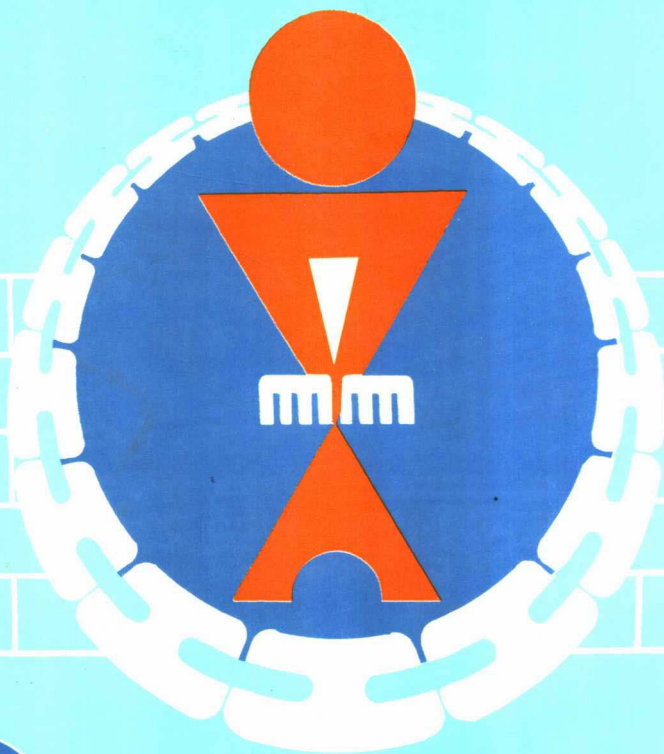


共黨問題研究叢書

中共高級幹部的悲劇

陳克煒 編



生活類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一、劉少奇（中共「國家主席」）

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註一），遭受批鬥、抄家、「坐飛機」，拳打腳踢，揪頭髮，被打得鼻青眼腫。妻兒都被迫遠離，健康受到嚴重摧殘，病得不成人形，經常把屎尿屙到身上，但看守的人不給他換衣褲，弄得全身髒臭，困苦不堪。在重病垂危時被遣送開封，終於孤獨悽慘地死去。死後還受到侮辱改名，連妻子兒女都不知道他的死訊。

中共「大公報」報導：

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劉少奇雖然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國家主席，但實際上已不能過問黨和國家的事務，而是匿居在中南海的住所中，忍受莫須有的政治創傷，艱難度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戚本禹指使中南海的一些人，組織了造反團、戰鬪隊，對劉少奇王光美夫婦進行了兩次批鬥，在劉少奇的住處貼了「打倒中國赫魯曉夫」等大標語。一月十二日，更有一百五十餘人喊着口號，衝進劉少奇的住地，要劉少奇低頭彎腰，背語錄。在這次批鬥中，帶頭的是康生的女兒，康生、戚本

禹的老婆。這僅是劉少奇遭受屈辱的開始。在一月下旬，劉少奇家中的電話就被撤走了。從此就切斷了劉少奇同黨中央領導的聯繫。

一九六七年四月戚本禹拋出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誣陷文章，拍桌子瞪着眼睛，誣陷劉少奇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少奇理直氣壯地指出，戚本禹的文章不對頭，他還莊嚴宣佈「我不是反革命，也不反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我第一個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劉少奇對他的可恥誣陷野蠻迫害，感到十分氣憤。他說，憲法是我報告的。我現在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要法庭審我，要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撤職，才能罷免了我的國家主席？！

但在那個時候，劉少奇已經預見到他的悲慘命運是無可防止的了。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對他的四個孩子說：「我有什麼罪？我革了一輩子命，現在倒成了反革命、三反分子。」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按照中央文革那些人的策劃，組織了三、四百人，分別將劉少奇、王光美夫婦關了二個多小時。在關押時，並組織了一批人進行抄家。批鬥後，將劉少奇、王光美分別監押起來，不准與子女見面。並有二個人進入室內日夜監視。國家主席竟被作為囚犯看待，他們要收去劉少奇的腰帶。劉少奇不給，便由四個人把劉少奇按倒床上，強行收去。林江反革命集團的大大小小的成員，如此對付國家主席，實際上就是對國家尊嚴的嚴重破壞和侵犯。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所謂八萬人的批判大會，同時在中南海再次由江青的女

兒、康生的老婆督師，集中三、四百人批鬥劉少奇、王光美。在劉少奇被架入會場時，還拍了電影，鬭爭時劉少奇被強迫低頭，彎腰，「坐飛機」，並且拳打腳踢，揪頭髮，還把一張侮辱人格的漫畫套在劉少奇的脖子上進行拍照、拍電影。鬭爭了二個多小時，劉少奇被打得鼻青臉腫。那時他已是六十九歲的高齡，被架出時腰腿疼痛，光着腳（鞋被踩掉），痛苦、疲倦不堪地回到屋裏。這樣極端殘酷的迫害，已把黨的原則和國家法制踐踏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劉少奇在對他的批判中多次當場進行答辯，並且寫了文章材料，作有力的申述。但得不到答覆。一九六七年八月，劉少奇在一封申述信中說，說我的目的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要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要陰謀篡黨篡國，我是不能接受的。他並請求免去他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結果也未得到答覆。

劉少奇在政治上遭到誣陷迫害、殘酷鬭爭，和家屬隔離，其子女被逐出中南海，還在生活上處處折磨，最終被置於死地。

一九六六年六月至一九六八年初，劉少奇被迫到職工食堂打飯吃，有時只給窩窩頭，因假牙咀嚼困難，只能喝點菜湯充飢，但手又顫抖，食物往往送不到口裏。在被隔離期間，他患了病，也得不到及時的治療。一九六八年四月，病情嚴重發展，動作失常，有時神志不清，假牙上下倒裝，走路拖行，站立不穩。然而，林江反革命集團的暴徒們還說，不能排除劉有意這樣做的可能性，甚至還提出為防止他行兇和

自殺，採取了進一步強行「監護」的措施，真是天良喪盡，人性喪盡。

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劉少奇的病情發展極為嚴重，才組織專家進行了會診，經檢查，確認爲肺炎感染，主治大夫認爲需要住院治療，但未被允准，由七月十日至二十四日，經專家七次會診和治診，當肺炎開始好轉，但還未完全控制時，就把醫生撤走。因此八月至十月上旬，病情又多次反覆，支氣管重覆感染。醫生認爲，患者年老，天氣漸冷，反覆感染，今冬可能發生生命危險。至十月九日劉少奇又完全不能進飲食。於十月十一日起，實行「鼻飼」，直至病故。同時，也逐漸不能講話，十一月七日，突然發抖，呼吸急促，嘔吐，臉色蒼白，發高燒，血壓上升，大汗淋漓。經治療後，逐漸穩定，但一直不能吃飯，不能講話，下肢不能動，大小便失禁。瘦得皮包骨。對這種嚴重病情，未採取有效的治療措施。一代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就在這樣的病痛中遷延時日。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晚，劉少奇被秘密送往開封，交給河南的林江反革命集團追隨者，加以「監護」，當晚護理人員急忙地給他穿了一件上衣，連褲子、襪子都未穿，裹了一床棉被，就被用擔架抬上救護車，送往機場。劉少奇到開封時已處於昏迷狀態。

在開封被「監護」的地點，是一個銀行的舊址，臨街有兩層樓的磚牆，窗上安有鐵欄，完全與外界隔絕，監護的醫護條件極差，病房很小，病床很硬，不能不多墊了幾床被褥。在這種情況下，劉少奇曾於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上旬三次病危，發高燒，但監護的地方沒有檢查設備，又不准會診，只按肺炎治療。十一

月十日起，又發燒，至十二日凌晨，體溫上升到三十九點七度，呼吸困難，嘴唇呈紫色，雙瞳對光反應消失，到十二日早晨六時四十五分，這位為中國革命奮鬥終生的偉大人物心臟停止了跳動，劉少奇就這樣悲慘而死。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四日香港「大公報」）

中共「人民日報」報導：

十月十七日晚九時許，一架飛機降落在開封機場。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這架飛機的乘客是誰。

接受「緊急任務」的幾位醫護人員爬上了舷梯，來到後艙。只見後艙裏放着一副擔架，擔架上躺着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不知什麼原因，這位老人沒有穿衣服，只裹着一條粉紅色的緞被，被子上蒙一條白色的床單。老人兩眼緊閉，鼻孔裏插着鼻飼管，瘦削的面龐蒼白失色，他那孱弱的身體靜靜地躺在擔架上，好像一點活動的氣力也沒有了。從他微弱的呼吸看，他沒有死，還有一息尚存。

他那熟悉的面孔，並沒有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這不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同志嗎？醫護人員怔住了，禁不住一陣酸痛之情湧上心頭。

少奇同志被拖下了舷梯：救護車在漆黑的夜路上向市區駛去……

這個小院前後左右都不臨街道。

救護車開進了市人委大院，少奇同志被抬進了這個獨特的小院內。從此，執行這項「緊急任務」的醫

護人員，也就失去了自由。他們被指令，不准外出，不准給親友寫信，甚至連妻子、丈夫、兒女都不准有任何形式的往來，並且一個個都以黨性、生命作了保證。他們事實上被軟禁起來了。思想也被禁錮了。他們沒有笑臉，彼此沒有交談，默默地作着自己要作的一切。

天井院外被重兵把守着。那些人民的子弟兵，只知道自己在執行任務，天井院內的一切，他們全然不知道啊！

又是一座特設的監獄出現在祖國大地上！裏邊監禁着的，是國家主席——彌留的劉少奇同志。因為少奇同志是十月十七日到達開封的，故而被稱之為「十七號任務」。

……

少奇同志閉上了雙眼，靜靜地躺在病榻上。他一句話也不說，在極度的困苦中，也沒有一聲呻吟。他在思索些什麼呢？

他患的是肺炎和糖尿病，早已不能從口腔進食了，全靠從鼻飼管中打進的流食，維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醫護人員只有定時做流食，定時幫他翻身，進行簡單的藥物治療。除此之外，別的有什麼辦法呢？

……

少奇同志的病情惡化了。

請求調撥藥物，答覆是：根據當地條件進行治療。實際上是被拒絕了。

幾天前組織起來的一個醫療班子，不知什麼原因，一直沒能出現在少奇同志床前。

守護在少奇同志身邊的醫護人員，曾提出是否讓親屬來最後見上一面？結果是誰也不敢作主，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晨六時四十五分，少奇同志的心臟停止跳動，妻室兒女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沒能來到他的身邊。何止這樣，他們連少奇同志的去處，死在那裏都不知道啊！

從少奇同志十月十七日到達開封，到十一月十二日溘然長逝，共二十七天。二十七天中，祖國上空又增添了幾多陰雲？面對那翻滾的雲層，少奇同志在天之靈，又該思索些什麼呢？

一套普通的衣服，作為壽衣穿在少奇同志骨瘦如柴的身上。

十五日零點剛過，一輛靈車向開封市東郊火化場駛去。

少奇同志的頭和面部全部用白布嚴嚴實實地裹了起來……

少奇同志生前戴的罪惡帽子似乎還不够多，不够重，死了以後新戴的帽子是：「烈性傳染病患者」！靈車是「六九」型吉普車代替的，車身容納不了少奇同志的高大的身軀，他的兩只腳露在車廂外……沒有一個花圈，沒有一朵白花，沒有一寸黑紗。有的是陰沉而漆黑的夜幕，如泣如訴的秋雨……靈車徐徐行進在古城的街道上，周圍的一切都在沉默。

因為是「烈性傳染病患者」，當靈車來到火化場時，有人正在那裏噴洒消毒劑。不可能舉行任何形式的悼念儀式；少奇同志的遺體被匆忙地送進了火化爐。

與此同時，他生前在開封時的遺物也付之一炬，灰飛烟滅了。

少奇同志當年長期在白區從事革命活動，不知用了多少化名，可他萬萬沒有想到，作為國家主席，去世後仍得把名字再次隱埋起來。

這是少奇同志的骨灰寄存證；

骨灰編號：一二三

申請寄存人姓名：劉原

現住址：××××部隊

與亡人關係：父子

死亡人姓名：劉衛黃

年齡：七十一

性別：男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第二版）

香港「爭鳴」月刊報導：

經過幾次批鬥，劉少奇的健康已受到嚴重摧殘。七月十八日的一次批鬥會之後，劉少奇的家還被抄了，劉少奇和王光美（註三）也彼此隔離，他的子女們早已和他隔離開，劉少奇成了孤零零的一個人。

……到一九六九年的時候，劉少奇已經病得不成人形了。瘦削、憔悴、頭髮鬍子又長又髒。他的手不停地顫抖，自己沒法控制，連擦根火柴都擦不着。他雙腿也漸漸失去機能，不到十公尺的路，他都要扶着牆壁和桌椅慢慢地蹭很長時間。所以，他經常來不及上廁所，把屎尿都廁在身上。那些看守他的人不給他換衣服，任他如何髒如何臭，也沒有人管他。長時間的臥床，劉少奇身上長滿了褥瘡，混合着屎尿骯髒，發炎、流膿，發臭……臨離開北京時，看管人員索性把他的褲子剝掉，用毯子一裹，就抬走了。

……………

劉少奇在開封悄無聲息地逝世了，沒有人知道他的死訊，甚至他的妻子兒女也都一無所知。

（一九八〇年三月「爭鳴」月刊第廿九期）

註釋：

（註一） 劉少奇，湖南寧鄉人，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二一年春入蘇聯「東方勞動大學」，同年冬加入中共。一九二二年返國從事中共工運活動，一九三七年任中共幹部部長，因協助毛澤東打擊王明（陳紹禹）獲毛信任。一九四九年，出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八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文革期間被批鬥，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一九六九年由北平遣送河南，死於監獄中。終年七十三歲。

（註二） 「爭鳴」月刊：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在香港創刊，在言論上支持鄧小平政策路線，並為中共從事統戰宣傳。但為

適應海外環境，其言論態度順較大陸內部報刊為開放。

(註三) 王光美，河北天津人，一九四三年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作研究生兩月，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共，並與劉少奇結婚。

(註四) 「動向」月刊：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在香港創刊，言論立場與「爭鳴」月刊相近。

二、彭德懷（「元帥」、「國防部長」）

中共「元帥」彭德懷（註一），在七十多歲的時候，在成都被揪到北平批鬥，身上挨拳揍，肝部挨皮鞋踢，肋骨被打斷兩根，又被抓著搞「噴氣式」（註二），手和胳膊都被摔壞，脖子上掛著大牌子，光著頭被押在卡車上遊街示衆，關在門窗緊閉的黑屋子裏，穿著破爛的衣服在潮濕的地上爬行哀喚，無人理睬。直到臨死時，還在用最後的氣力高呼：「我沒有反對毛主席！我沒有裏通外國！」

彭德懷的侄女彭梅魁等在悼文中說：

啊，親愛的伯伯，我們把回憶翻到最痛苦的一頁了，我們常常不忍心回顧這一段歷史，可是我們的記憶，却把這一頁記錄得格外鮮明，叫我們一輩子也難以忘記。……在一九六六年底，……他們把您從成都揪到北京，從此，您彷彿進入了十八層地獄，挨鬥、遊街、用拳頭揍您，穿了皮鞋踢您的肝部，無所不用其極。每當我們看到您被抓着搞「噴氣式」，看到您脖子上掛着大牌子，光着頭被押在卡車上遊街，我們心如刀絞，悲痛萬分，……一九六七年四、五月的一天，有人找到梅魁家裏，通知讓我們給您送些衣服和日用品，這時，我們可高興啦，因為我們得知了日思夜想的伯伯的下落，我們又可以見到您了，在急迫的心情催促下，我們立即準備好了東西去看望您，可是，到了目的地，一腔熱望被一瓢冰水潑滅了，他們不允許我們見您，經過再三哀求，才允許給您寫幾句話。幾天後，我們收到了您的回信，信是這樣寫的：梅魁：烟我戒了，以後不要送烟了，……你要景希珍（伯伯的警衛參謀）把我的半導體收音機送來，按照書名（都是馬列著作）把書寄來。我們把您的回信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雖然只有短短幾句話，我們彷彿看見了您的身影，理解到了您剛直不阿的性格，聽到了您那洪亮的談話聲。按照您的願望，我們把東西如數送去了。可是幾天以後，送來了您的紙條，囑咐我們以後不要再給您送東西了。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使我們疑慮重重，坐立不安。我們斷定，他們對您的看管審查一定更加嚴厲了。您不讓我們送東西，是不是怕連累了我們？不，伯伯，我們不怕連累，實際上，他們也是放不過我們的。伯伯，您不知道，我們也不能讓您知道的是：老家被抄了，牆上刷滿了誣蔑您的大標語；我們兄弟姐妹幾乎人人受審

查、挨批鬥。什麼「階級異己份子」，什麼「繼承了你的反骨」，大堆大堆的帽子扣到了我們頭上。他們還早有明確指示，「表現再好也不准入黨」。起超多次慘遭毒打，死去活來，至今還留下了腦震盪的後遺症……伯伯啊，這些我們都不講了，講了怕您爲我們難過，爲我們落淚，我們的責任是安慰您，那能給您增添一絲一毫的苦痛呢？我們繼續給您送東西，一次一次又一次。啊，春天來了，桃花開了；冬天來了，雪花落了，三年，五年又過去了，我們仍然得不到您的消息。我們由疑慮、擔心變得害怕了，……一九七三年四月廿三日，有個專案組的人找到梅魁說：「你伯伯病了，去醫院看看吧！」當時，梅魁既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能夠見到六年多沒有照面的伯伯了，擔心的是不知您究竟被他們折磨成啥樣子？來到醫院，那人把梅魁引到病房門口，門口站着個看守人員，室內的氣氛也十分森嚴，窗戶用報紙從底下直糊到頂端，本來北屋就不敞亮，這下子更暗了。梅魁一見病床上的伯伯，張了張嘴，怎麼也呼喊不出來，一陣心酸，眼淚差點兒奪眶而出，但一想旁邊還有專案人員，又馬上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不能哭，哭是軟弱的表現，哭反而會增加伯伯的痛苦，想到這，就鼓足了勇氣，喊了一聲：「伯伯！」撲了過去。當時，您像往常那樣，親切地拉住梅魁的手，慈祥地看着她說：「你怎麼來啦？倒長胖了。」從您那面部表情，說話聲調和顫抖着的手，可以看出您也是百感交集。講了一會話，梅魁問道：「我們給您送東西，爲什麼不寫個回條？」您一聽，頓時火了，指着那個專案人員大聲喊道：「寫回條？什麼都沒有，連支鉛筆也不給！」您又指了指窗戶說：「看這房子，封得這樣嚴實，連窗外的景色也不讓我看看，住在這裏比月婆子還

難受。」您還告訴說：「收音機也被人故意弄壞了，連廣播也不讓聽。」梅魁又問您生活得怎樣，挨過打嗎？您怕姪女難過，沉默了好一會，才說：「生活我是不怕苦的，打是挨過……」您不願意說下去了，專案人員催梅魁快走，您說道：「走吧！以後不要再來看我，免得妨礙工作。」就這樣，梅魁揮淚向您告別了。四月廿五日，那個專案人員又把梅魁找到醫院，說您的身體情況惡化了，要動手術，您不肯，要我們勸勸您。聽了這話，猛如霹靂擊頂，梅魁的一顆心，好像從懸崖上突然跌進萬丈深淵，伯伯呀，您怎麼這樣命苦，審查批鬥還沒結束，病魔又來纏身，為什麼疾病常是當壞人的幫兇呢？梅魁壓了壓自己的感情，向病床前走去，她看見您若有所思地坐在病床上，緊閉雙唇凝視着牆壁，就大聲叫了聲伯伯。您沒有吭聲，掃視了一下梅魁，才說：「我要求出院，不作手術！」梅魁問：「您是不是害怕手術！」您斬釘截鐵地回答道：「不，我參加革命到現在，就從來沒有怕死過，我現在死了，也是長壽。」您對在場的那個專案人員說：「手術前我要求去見毛主席！我有事要見毛主席！明天手術，我今天去見毛主席，把我對問題的看法講清楚，也算盡到我最後的一份責任！」您越說越激動，從床上下來，要向門口走去。伯伯，您的心情我們是深深理解的，您已經七十五歲高齡了，却遭受了這麼些年的折磨，光這無休無止的審查就進行了八年，還不知道何年何月結束。可是您的生命，已到了危險的關頭，您當然想見毛主席，您多想對毛主席談一談呀。可是，……他們硬把您關在病房不像病房，監獄不像監獄的屋子裏，連明媚的陽光也不肯給您。把一員馳騁萬里的戰將，活活地囚禁在十幾平方米的屋子裏，有耳不能去聽，有嘴不能去說。伯伯，

您做完手術以後，身體急劇惡化，左半個身子已經癱瘓。當我們去看望您時，您用盡全身的氣力也沒有坐起來，您躺在床上怨憤地喊道：「這怎麼辦？這怎麼辦？我癱了，自己不能料理自己了，可是案子還沒有搞清楚呀！……」您那時用眼睛直盯地望着我們，好像我們能給您一個答案，您望得我們加倍的心酸，我們竟不敢再看一看您那眼睛。因為，那時候，希望在那裏？又有誰能給您一個明確的回答？……在那時，我們都想去護理您，可是由於種種限制，不讓我們陪住，我們只能在星期天裏去醫院看望您，您越在最後階段，越想念毛主席，提到他老人家的名字也比尋常多，您經常喃喃自語：「我現在要是能見到毛主席，該有多好，該有多好呀！……」您還囑咐我們：「我死後，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埋在地下，上面種上蘋果樹，骨灰可作肥料。」您在臨終之前，還在用最後的氣力高呼：「我沒有反對毛主席（註三）！我沒有裏通外國！」伯伯，聽着您那呼喊，怎不叫我們淒然淚下呢？噩耗終於傳來，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梅魁接到專案人員的電話通知，得悉伯伯是當天下午三時卅五分停止了心臟跳動。在急切中，梅魁又找不到康白、彭鋼他們，只好獨自趕到醫院。她見伯伯靜靜躺在床上，那戎馬終生，歷經百戰的身軀，這回永遠地躺下了，帶着沒來得及傾吐的冤屈躺下了。啊，伯伯，他們連梅魁痛哭一場的時間也不給，更不讓所有的姪兒姪女來最後看您一眼。他們只給了梅魁廿來分鐘時間，匆忙、草率地料理完後事，就被送回廠裏。伯伯，不是我們不願去向您告別，不願將您的骨灰盒拿回來保存，是「四人幫」一夥連一點人道主義也不講，他們推行的是法西斯專制主義呀！啊，伯伯，敬愛的伯伯，那時，我們是多麼覺得冤屈，多

想高聲大喊爲您鳴不平啊！因爲您不是正常病逝，更不是血洒疆場，而是被那些壞蛋活活窒息而死的。可恨那些戴着紅帽子，藏着黑心肝的人都成了「響噹噹的革命家」，大言不慚地坐在審判席上，而您們這些老一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却被套上了「叛徒」、「特務」的帽子，投進了監獄，這是一個多麼荒唐的顛倒啊！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解放軍報」，彭梅魁、彭正群、彭康白、彭綱：「淚水沾濕的回憶——懷念我們的伯伯彭德懷」）

香港「動向」月刊報導：

彭德懷在四川住了四年，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這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當然不會放過彭德懷。廬山的鬥爭，是文革的遠因；「海瑞罷官」，是文革的第一根導火線。彭德懷這個「海瑞」，首當其衝。北京的一羣紅衛兵，衝到四川，把彭德懷揪回來批鬥。

彭德懷行伍出身，一生沒有蓄過髮。批鬥的時候，別人可揪頭髮，他無髮可揪，紅衛兵就揪他的耳朵。他被揪着耳朵，在北京批鬥了很多次。

在北京的一間高級監獄裏，一個老年的犯人在地上爬着。他病重、衰弱，不能行走，只能在潮濕陰森的地上爬來爬去。他渾身的衣裳都爬爛了，一條條，一片片，遮不住他污穢不堪的身軀。他一次又一次地爬到牢房門口，用虛弱顫抖的聲音哀求看守：「給我家裏人寫封信吧，讓他們給我送點衣服和日用品來：

……看守彈笑着，一次又一次地經過他的門口，却一次又一次地離去，根本不理睬……

這個在地上爬行的老犯人，就是彭德懷。正當社會上流傳着彭德懷每天仍然打太極拳的小道消息時，彭德懷却在監獄裏爬來爬去。他被關押了八年，他在地上爬行……誰能想到，這竟是一個英雄的暮年呢？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廿九日，彭德懷終於被「釋放」了。就像法國畫家杜米埃的一幅畫：獄卒摸着一個死囚犯的脈搏，對劊子手和法官說：「現在這個人可以釋放了，他再沒有危險了。」彭德懷就是這樣，永遠離開了監獄。也離開了人間……

（一九七九年九月香港「動向」月刊第十二期）

中共「大公報」報導：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戚本禹十分得意地寫密信向其主子江青報告：「彭德懷現在已經被紅衛兵抓住，一二日內即押送北京。北京的學生已經做了鬥爭的準備。」

在北航首次召開的批鬥會上，韓愛晶等人如狼似虎地撲上去，連續將彭總打倒了七次，前額打破了，肺部受了重傷。

批鬥會上，彭總經常是光着頭，脖子上被掛塊沉重的大牌子，搞「噴氣式」。有時把他拖到卡車上遊街，有時十幾雙手劈頭蓋腦向他打來，有的用穿着皮鞋的腳往他身上踢。批鬥會一場接一場，彭總渾身傷痕斑斑。下面讓我們從「關於彭德懷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一九六八年二月在衛戍區監護期間的動態」中摘抄